

中华金：逆境生存的美国华人经济

赵小建

摘要：华人在美国写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在排华运动和种族隔离时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族裔社区，在逆境中不断探索和寻找谋生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结盟，使华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美中在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又使很多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亚洲的崛起和美中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中地位的提升，给华人企业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美中两国的竞争已成国际关系焦点，美国华人经济能否经受住更大的考验？也许认识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

关键词：美国华人；族裔经济；全球化；供应链；美中关系

中图分类号：F113；K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1)03-0056-08

“中华金”的概念是美国地方史学家桑迪·莱登提出来的。在《中华金：蒙特利尔海湾地区华人的足迹》一书中，作者考证了加利福尼亚北部沿海地区早期华人移民的历史遗迹，对华人的谋生之道有独特的见解。莱登发现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华人有着极其坚韧的毅力和超乎想象的智慧，这使他们能够在逆境中生存、探索并发现机遇。他指出，早期华人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有所发展，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发掘了“中华金”。^[1]

从1849年美国西海岸的淘金热开始，华人远离故土，已经在美国走过了一百七十多个年头。他们在异乡艰苦跋涉，历经了各种挑战。19世纪下半叶种族议题政治化，排华浪潮在加州兴起并席卷美国。通过国会立法和法院的背书，排华政策制度化，对华人的歧视和暴力成为社会常态，也成为以后排斥和反对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印度等地亚裔移民的基础。^①在政府和暴民的双重打压下，华人的处境极其困难。他们被骚扰和驱赶，他们的住房和工地被烧毁，很多同胞被杀害。华人劳工没有正常的就业机会，不能和普通美国人公平竞争，单靠刻苦耐劳和辛勤付出是难以生存的。然而，在排华势力当道的那几十年里，虽然大批移民返回了故

土，但是华人作为一个族裔群体并没有在美国消失。他们在外界的压力下抱团发展，建立了自己的经济体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才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职场，其社会地位也开始提升。

亚洲的崛起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给在美国的亚裔中小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华人如鱼得水，在全球供应链发展中展示出了特有的优势。全球化穿越了疆界，冲击了国家的限制。当各国逐渐纳入统一的经济轨道，原有的世界格局也有所调整，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变数。目前，美中两国不仅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要角，也是新一轮国际关系的焦点。一场以美中较量为主题的贸易战已经使华人业者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这个充满了未知的时刻，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华人在美国的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看看他们经历的艰难和曲折，以及他们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不易。

一、什么是“中华金”？

什么是“中华金”？据莱登解释，“中华金”是早期华人在美国赖以生存的独特又具有排他性的

作者简介：赵小建，女，上海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文理学院本科生副教务长、终身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移民、种族关系、美国华人社会、族裔经济。

经济资源。这种由华人发现并成功开发出来的“金子”，往往是美国白人不屑一顾的，油菜花就是一例。莱登研究的北加州蒙特利尔地区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把油菜籽带到了北美。油菜繁殖迅速，很快就侵蚀了原始的草本植物，占领了山头地间。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为蒙特利尔海湾地区披上了一条金黄色的毯子，美不胜收。但是，野生的油菜盘根错节，消耗了土地的养分，高过人头的花枝又是野生动物的天然屏障，使农家感到十分头痛。来自广东的华人移民掌握了榨油技术。1860年间，有个叫吉姆的华人来到了三望谷，他挨家挨户拜访了当地的农民，毛遂自荐，自愿帮助他们清除这些“野草”，以收下的菜籽作为交换条件。农户们求之不得，拍板成交。于是吉姆召来了几十个同胞，清理了一片又一片的土地，收下的菜籽打包装袋，卖了个好价钱。据说这笔生意让吉姆净赚32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华人开辟捷径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华金”的典故由此而来。^②

变“杂草”为“金”，说的是早期华人独特的发现和运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太平洋铁路修建完成以后，华人分散到加州各地讨生活。他们独具慧眼，在蒙特利尔沿海地带开发了捕鱼业。除了各种海鱼，他们还充分地利用了当地的海水资源，把鲑鱼、淡菜、鲍鱼和海带等海产晒干，远销国内外市场。在美丽的海滨城市蒙特利尔，当年华人工作过的罐头工业遗址（Cannery Row）现在是主要的旅游商业街。早在一百多年前，华人就用贝壳做成首饰和装饰品在景点出售，这些琳琅满目的小工艺品至今还是外来游客的最爱。在萨利纳斯平原，华人劳工成功地引进了多种农作物，使当地单一的小麦经济转向包括水果蔬菜在内的多种植物经济。与圣塔克鲁兹为邻的沃尔森维尔是个农业重镇，早年的斯拉维克移民在那里种上了大片的苹果树。但苹果产量和质量都受气候影响，除非能够把水果及时加工处理，否则果农的收益是完全没有保证的。华人移民是苹果加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中华烘干机”，日夜运转。由于提高了脱水效率，不仅是收获下来的过剩的苹果，而且在苹果生长期疏下来的尚未成熟的果实都可以做成苹果干，使苹果加工成为沃尔森维尔以及圣塔克鲁

兹的标志性产业。^③

“中华金”是美国非主流经济发展的特征，反映的是少数族裔群体的一种谋生形态。在美国历史上，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是因人而异的，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莫过于种族和肤色了。1860年美国内战以后，黑人虽然在法律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社会里，很多问题并不是靠一纸法律就可以解决的。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废奴法没有为昔日奴隶提供作为公民的最起码的权利。有色人种在被社会挤压和边缘化的情况下，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他们只能挣扎在社会的底层，在白人不屑一顾的角落里讨生活。“中华金”说的是华人的故事，也可以用来解读美国族裔经济体系的发展。

二、排华运动和种族隔离

1848年，有人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沙加缅度附近发现了金矿。消息不胫而走，大批淘金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加利福尼亚一夜之间变成了致富天堂。相比较欧美和澳大利亚等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淘金者不多，基本上是广东人。当时除了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地，亚洲大部分地区 and 外界接触甚少，日本和朝鲜均处于闭国状态，并没有受到淘金热的影响。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就不同了，作为东亚第一个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国家，清政府禁止离境的政策几乎成了一纸空文，一些广东沿海地区的居民远涉重洋，加入了淘金的浪潮。

淘金热开创了亚洲人向美国移民的先河。金矿衰竭之后，华人劳工投入了多项开发西部的工程。他们不畏艰辛，完成了贯通全国的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他们开山铺路，把穷乡僻壤与主要铁路干道连接，使许多分散在各地的小镇村落有机会发展商业经济，或成为旅游和度假胜地；他们修建了水渠和河，变荒山沼泽为良田，使加州的地价直线上升。^[2]这些贡献为华人劳工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可是，由于种族和肤色的不同，华人在美国生存举步维艰。19世纪下半叶，种族主义风行于美国政界民间，南部黑人遭到种族隔离和暴力袭击，很多人失去了投票权。反有色人种的浪潮并不局限于

南部。加州因为没有蓄奴史，政治家们常常以进步派自称，在劳工自由等议题上占据着道德上的制高点。但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奠定了白人至上这一文化基础，也决定了种族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大批欧洲移民涌入加州以后，由于本土印第安人早已从公共视野中消失，西部的黑人又很少，华人作为最大的有色族裔群体，自然就成了种族仇恨的对象。华人劳工干的是最繁重的体力活，得到的是最低的报酬。他们做的往往是白人不屑一顾的工作，但却被塑造成抢饭碗的人。“黄祸论”甚嚣尘上，一旦普通劳工深信是华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排华思潮便如山火般蔓延开来。

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排华运动已经席卷美国，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议题。在《中国佬，滚！》（*The Chinese Must Go*）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Beth Lew-Williams教授指出，19世纪末遍布美国西部各地的反华暴力是和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帝国野心相辅相成的。^④尽管华人劳工的贡献显著，美国各阶层也都有人对他们的勤奋和智慧赞赏有加，但是他们的肤色是无法改变的。每当经济低迷、社会动荡时，就会有政客拿华人做替罪羊，加以丑化和诬蔑，用以煽动民心。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各地的宣传工具纷纷出动，报纸和漫画把华人塑造成抢美国人饭碗的恶棍、伤风败俗的流氓和传播病毒的贱民，似乎华人是经济萧条以及所有社会弊端的根源。^⑤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赞同这种污名化的舆论，但是如果有人胆敢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就立刻被贴上Chinaman's lover（中国佬的粉丝）的标签。“中国佬，滚！”是当时最时髦的政治术语，很多报纸都用来做专栏的标题。在无良政客和媒体的煽动下，不满现状的老百姓产生了对“黄祸”的恐惧，也有了宣泄的对象。华人劳工的落脚点和商业区纷纷成为作案的目标。仇恨华人的暴力浪潮恰到好处地配合了联邦政府的移民议题。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项以种族为标准的控制移民法，宣告了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移民的国家，这是种族主义的一大胜利。这项法律也为以后阻挡日本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和印度人的移民政策铺平了道路。

在《排华法案》实施的六十多年里，华人移

民还因为其人种和肤色而成为法定的“不得归化入籍的外国人”（Alien Ineligible for Citizenship）。此后经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次裁定，这一法则成了黄种人的专利，适用于来自日本、朝鲜和印度等国的移民。^⑥亚裔移民的政治地位由此界定：他们不能归化入籍，也就永远不能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⑦联邦政府拍板以后，各级地方政府也竭力效仿，有的巧立名目向华人征收苛捐杂税，有的别出心裁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上对华人进行种种刁难。通过立法，加州等地禁止华人购地置产，禁止华人出庭作证，禁止华人和白人通婚，还禁止华人子弟和白人一起上学。在华人最集中的旧金山，华人的打扮和生活习惯都没有对他人造成任何不便。尽管如此，市政府还是频频发难，颁布了剪辫子法（Queue Ordinance）、禁止路边挑担法（Sidewalk Ordinance）和就寝空间法（Cubic Air Ordinance）等一系列规定，肆意对华人进行骚扰和迫害。

种族主义制度化以后，华人得不到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暴徒们肆无忌惮地烧毁华人住所，抢劫华人的店铺，杀害无辜。大规模的驱赶行动在西部大小城镇都有发生，持枪的暴民把华人成群结队地绑架起来，逼着他们登上远洋轮或火车，并警告他们永远不得返回。^[3]在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散居各地是很危险的，华人只能集聚在一起，与外界隔离。华埠（俗称唐人街）也应运而生。

三、华埠社会与经济

虽然聚居和隔离是不得已的选择，外界的压力倒也促进了华埠内部的团结。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不少文化和商业活动至今保留了鲜明的族裔特色。打族裔招牌的商业区（甚至城镇）既是特定群体的活动中心，也凸现了城市的多元色彩。新移民在国外抱团结社，有利于文化传承，也可以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联谊情感、进行互助。这种互助机制削减了异乡生活的困苦，使他们能够逐渐地向主流文化过渡。华人在族裔建设方面很有建树。他们早在19世纪后期就有了相当健全的社区组织体系，发展了多种服务设施，创办了中文学校。华人社区还负责仲裁内部纠纷并对成员进行监督和控

制。这样的民间管理机制在美国并不多见。在《排华法案》实施期间，华人必须持有社区颁发的离境证才能购买远洋轮的船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旧金山和纽约等地的华埠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活动，引起了主流社会的关注。其实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农村，有很强的地方宗族观念，各地华埠都有帮派势力，“堂斗”有时还惊动了警察。华人内部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的明争暗斗更是没完没了。但是，在外人眼中，华人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整体，他们的社区有非凡的号召力，能够聚众集会，亦能抱团争取群体的权益。确实，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华人很少向外公开他们的内部纷争，更不会配合政府官员打击异己。政府官员曾多次根据线索在华埠调查移民假案，但由于得不到华人社区的配合，也没有人愿意提供证词，这类调查很少有预期的结果。这种里外有别的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种族隔离的副产品。当排华反华制度化，华人不断受到外界的歧视、排斥和打压的时候，族裔社区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关于早期华人的社区组织结构和作用，《重建家园：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赘述。^[4]

不可忽视的是，在种族隔离时期，族裔社区为华人提供了就业的保障。关于华裔社区的经济结构，目前学术界还缺乏深度研究。大多数学者强调了华人经济的封闭性，认为这一经济是依靠内部的廉价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实现自给自足的。早期华埠的饭馆、杂货店和洗衣店确实都由华人经营管理并面向以华人为主的消费群体（洗衣业除外）。也就是说，华人既是业主和伙计，又是消费者。这种现象不奇怪，因为职业隔离是种族隔离的一个重要方面。1870年以后，加州的主流企业几乎不再雇佣有色人种，工会会员也是清一色的白人。问题是，一个没有独立的农业和制造业的非主流经济，如果和主流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完全脱钩，有可能依靠内循环持续很久吗？退一步说，如果完全没有挣钱的机会，为什么还会有很多华人愿意在美国生活，甚至想方设法把家人接来？

据地方史料显示，即使在被隔离的年代，华人也并没有在经济上和主流社会脱钩。在行业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的质量和价位是雇主的重要考量。经过了修建铁路和开山筑堤等庞大的基建工程

后，业界对华人劳工的素质是知道的。旧金山是大批劳工的聚居点，对外界来说也是劳动力的储备基地。虽然迫于种族政策和工会的压力，大企业不得不把有色人种拒之门外，但是在美国中西部和阿拉斯加，农业、渔业、矿业、伐木业、食品加工业和基建工业等很多行业还处于开发阶段，需要大量的临时工和季节工。这类工作收入低，没有保障，白人是不感兴趣的，这就给有色人种，特别是新移民，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华人是最早进入临时工这一劳动力市场的，步他们后尘的是来自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印度的移民，以及来自墨西哥等地的新移民。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华人又是怎样在主流社会找到谋生机会的？他们的工作形式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在种族隔离的早期，华人一般只能在比较偏僻的地区从事农业和矿业的工作。横贯全国的太平洋铁路开通以后，人烟稀少的西部中小城镇逐渐与主干线接轨，促进了加州等地的人口增长，为商品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早期农业的开发工程，包括修整土地、盖房、铺路和试种等，是需要大量人力的。1877年，美国国会在旧金山举行有关中国移民的调查听证会，有个名叫威廉·赫里斯特（William W. Hollister）的人告诉联邦政府官员，如果没有华人移民，他要在圣塔芭芭拉这样的地方务农是完全不可能的。^⑥赫里斯特是加州的一位很有名望的乡绅，其家族和华人劳工有很深的渊源。早年他从俄亥俄西行，看上了坐落在加州中南部沿海地区圣塔芭芭拉的戈利塔平原。可是那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原住民擅长牧业，没有人愿意整天给他干农活。于是赫里斯特跑了趟旧金山，带回了近百个华人。这批劳工按女主人安妮的要求在山坡上盖了栋华丽的住宅，还修建了大门和围墙，铺了车道，平整了土地，设置了灌溉系统。他们还进行了品种试验，种了桔子、柠檬、香蕉、橄榄、核桃、葡萄、咖啡和茶叶等五十多种农作物。豪华气派的赫里斯特庄园成为当地一景，也是社会名流聚会的场所，而它的主人也成了当地的头面人物。有了这个先例，附近的农家纷纷去旧金山找华人给他们盖房种地，使圣塔芭芭拉逐渐从牧场经济向农业经济发展。由于赫里斯特公开反对排华，他和铁路大王查尔斯·科若克（Charles Crocker）并列为加州两大

Chinaman's Lover。^⑨除了农业，华人还在西部的很多伐木场、铁矿、煤矿、玻璃矿和铜矿留下了足迹。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00年左右，华人已经离开了西部的农业地区，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华人的退出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选择，可以通过承包季节性的项目有计划地解决就业问题。比如，每年在蒙特利尔海边晒鱿鱼干和淡菜干的工人，捕捞季节一结束就会到不远的沃森维尔安营扎寨，那里的果农正开始给苹果树剪枝疏果，未成熟的果实不能上市，却是制作果干的好材料。这两个项目的衔接使华人的工作有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性。加州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也盛产多种水果蔬菜。食品加工种类种类繁多，遍布大小城镇，最早的工人很多是华人。虽然食品加工需要的是临时工，但是年复一年地承包使长期规划成为可能。承包一般以项目为计算单位，华人可以通过增加工时和劳动强度来提高收入。夏天是阿拉斯加三文鱼的捕捞季节，每年都有大批华人去那里的罐头厂工作。^[5]可以看出，华人在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劳工市场的一些季节性规律，也和主流社会的一些雇主达成了一定的默契。

到了1920年左右，华人又在制造业找到了工作的机会，收入也有了进一步的保障。美国的服装业在20世纪初开始推出大众化产品，制衣厂雇用了大批女工，对其改善工作待遇和环境的诉求却不予理会。1909年，纽约市两万多名车衣工人举行了罢工。两年后，纽约市三角地服装厂 (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 发生火灾，导致146名工人丧生，年纪最小的是一名14岁的女孩。这一悲剧在美国引起了震动。在公众和政府的压力下，车衣工人的工会得到了厂方的认可，厂方也不得不同意提高时薪和福利，改善工作环境并接受政府监督。^[6]所谓的“血汗工厂 (Sweatshops)”就此退出了公众视野。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些工厂在改善了生产条件和安全设施的同时，也逐步调整了内部结构，将部分生产线切割出去，缝制衣服的生产程序通过外包转移到厂外完成。精简后的服装企业不再需要雇佣大批车衣工人了，而被他们拒之门外的华人突然有了新的机会。

透过对族裔社区和主流社会关系的了解，可以看到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阶段性和以种族为特征的等级化劳工市场。早在全球化时代以前，服装业已经背离了

福特生产方式 (Fordism)，结束了从上到下的流水线操作，劳力密集的缝制部分被分割了出去，通过外包 (Outsource)，由少数族裔的工人完成。^⑩这一结构上的变化对服装企业可谓一举多得。企业不再需要雇佣大批的车衣工人，自然不必顾及这些人的待遇和福利，同时还可以省去厂房和设施的开支。把制衣工序承包给华人既可以巧妙地躲开公众视线，又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对于华人来说，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衣服缝制技术含量不高，投资要求低，有几台缝纫机就可以开个小厂，工人也可以在家里接活。经过企业和承包商的层层剥削，到了制衣工人手里的钱当然有限，但因为拿的是计件工资，家里男女老少都可以帮忙，家庭收入有所提高，大部分人也不再需要为了生计而四处漂泊了。

帮助移民同胞在逆境中解决就业是华人族裔社区的重要机制。华人劳力中介早在淘金时代就有所发展。^⑪在外人眼中，从事中介的华商是族裔社区的头面人物。他们举止服饰都很得体，能用英语沟通，有本事把几百人的团队调往千里以外的工地。^⑫早期的华埠中介是不挂牌的，中介人一般也在街上经营店铺，很容易找到。他们代表同乡和雇主谈条件，有时也提供劳动工具和交通，甚至负责质量监督。这些中介人在族裔社区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也使华人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大部分日本和菲律宾移民都是农业工人，由于工作流动性大，很多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没有固定的居所，但华人劳工很早就脱离了农业并成功地进入了食品加工和制造业。就业的升级为他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有利于族裔社区的发展。

四、世运与命运

不同于美国的白人和黑人，黄种人的命运还不时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1941年12月7日，美国在太平洋的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到日本的突然袭击，迫使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全面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冲突激发了美国国内的仇日情绪，给日裔美国人的生活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经罗斯福总统授权，近11万日本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被驱赶到指定的营区，集中安顿在临时搭建的简陋的木

板房里。这些营区如同牢狱，周围铁丝网密布，有荷枪实弹的军人站岗，营区居民不能自由出入。部分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公开表达了对日本的仇视，有的还和父母划清了界限，也有人希望通过参军来表达对美国的忠诚，但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德国和意大利也是美国在二战中的敌对国，德裔和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没有受到如此对待。种族和肤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华人带来的是与日裔美国人完全不同的命运。由于美中战时结盟，中国人突然成了美国人的朋友，华人也被主流社会接受，很多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第一次对美国有了认同感。战时人力短缺，军队和军工厂纷纷向华人子弟敞开大门，使很多青年进入了主流社会的职场，也第一次享受了和白人同工同酬的待遇。二战毫无疑问是华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排华法案》废除了，种族隔离成为历史。战后大部分华人逐渐移居郊外，华埠旧貌换新颜，成了很多新移民的落脚点。新移民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找工作有困难，处于灰色地带的族裔经济为他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直到全球化时代美国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制衣厂一直是很多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跳板。^⑬

然而，华人的好运并没有持续太久，战时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二战后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冷战期间，华人成了美国政府的怀疑对象，不少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遭到调查和恐吓，有的被逼供，有的被送上法庭，也有的被遣返出境，更多的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才得到改善。

华人族裔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反复。20世纪80年代有关“血汗工厂”的报道再次引起公众注意，有资料显示，一件一百美元的成衣，人工的成本只有六元。^⑭车衣工人大多是来自亚洲和墨西哥等地的移民，他们的工作环境很差。在洛杉矶地区，据统计，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制衣厂违章操作，工人的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⑮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种族差异和工人等级之间的关系，也很少有人关心新移民和有色人种的窘境。在社会的压力下，很多亚裔经营的制衣厂纷纷倒闭，新移民的就业问题仍然无人问津。

五、全球供应链时代的“中华金”

改善工人待遇的呼声并不是压垮制衣厂的最后一根稻草，产业链全球化才是美国制造业重组的真正动力。在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大企业有了更多的选择，服装加工很容易在境外完成。当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成功离岸，延伸到海外的低工资国家，境内的承包商就不再具有竞争力了，结果是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大量流失。

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是全球化经济的最大赢家，但制造业结构的变动所产生的反应可以是自下而上的。^[7]当产业链涵盖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时，跨国的、多层次的合作也不断形成。调节和管理每一个环节，包括原料生产、产品设计、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都需要配套的服务设施，由此产生的是无数个新的创业机会。

直到供应链全球化时代，少数族裔从业者才有机会显示出他们特有的竞争力。亚洲各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后，亚裔美国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有研究显示，加州硅谷地区一半以上的高科技企业（Startups）是华裔和印度裔美国人开创的。除了高学历和技术资源以外，这些亚裔企业家拥有超越国家地域的视野，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发资源，也比较能够把握跨国产业链中的创业机会。^[8]

制衣业离岸，受到冲击最大的是韩裔美国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移民美国的韩国人大多是从制衣厂起步的，车衣工作的外流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计。令业界人士惊奇的是，韩裔美国人不仅没有在服装业消失，而且还华丽转身，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出现。这一变化还得归功于全球化时代韩国本土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发的成功。大规模的行业集群、高素质的工人和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工资标准使韩国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理想彼岸。韩国移民在制衣厂失去的工作，很多实际上是到了他们同胞的手里。产业链横跨太平洋，其运作靠的是大量的专业人才和配套设施，而熟悉美韩两国语言、文化和业务交流的韩裔美国人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创业机会。到了世纪之交，韩国的东大门（Dongdaemun）在亚洲独领风骚，这个巨大的时装行业中心具有从

布料、加工、运输到产品批发等一系列功能，韩裔美国人也几乎同时在国际时尚界异军突起。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比较晚，但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行业集群都已经初具规模。产业链向中国的延伸给美国华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业机会。今天，韩裔和华裔美国人能够成为国际时尚界的实力派代表，和亚洲进入世界产业链是分不开的。

那么，制衣业离岸以后，亚裔在服装领域的位置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在洛杉矶高楼林立的时尚中心（Fashion Center）有很多新一代的亚裔从业者。他们大多是年轻的韩裔或华裔女性，不少人拥有设计和管理专业的学位，很熟悉时尚、市场和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他们在服装公司的档口接待客户，提供信息并建议可行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客户的要求设计产品，找工厂打样，接收订单。这些订单和样品设计通过网络传到大洋彼岸的服装资源聚集中心，那里的生产商接单后便开始下一阶段的生产流程。他们把选好的面料从一个工厂转送到另一个工厂，经过染色、裁剪和缝制等多道工序，再把最后的成品在通过检验后打包托运，送到客户手中。

那些在时尚中心档口挂牌的公司一般规模不大，但他们在供应链的上游运作，是生产的核心。有别于工业化时代以企业为中心的一体化的生产流水线，产业链靠的是众多企业的合作，是横向运作的。这种生产方式以客户为中心，可以量身打造产品。由于扩大了资源的选择范围，降低了成本，也更符合客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在现代通信工具和信息高度普及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甚至个体户都可以成为产业链的一部分并参与大规模的生产。当然，要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胜出，从业者必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就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和业务知识。在时尚界的亚裔从业者有条件在供应链两端建立可靠的关系户网络，为他们提供配套服务的打样、样品展示、批发、库存和运输等。这些都是全球产业链发展的副产品。

全球化提高了中华金的含金量，也提升了华人在主流经济中的地位。作为有色人种，早期的华人是没有资本讨价还价的。为了果腹和养家，他们只能增加工时和提高劳动强度，压价竞标是他们得以进入制造业的唯一秘诀。全球化改变了这种状况，

在供应链上，华人已经从低端劳工上升到上游运作的业主。随着更多的移民后代的参与，华人企业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各个生产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趋缓，冷战以后引发的对整个人类未来的思考和展望，为全球化的加速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通信开始普及，交通运输成本降低，打破了跨国公司的信息和资本垄断，使更多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国家和企业得以参与穿越疆界的生产。作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和经济体系是最大的赢家，但是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均，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反而加剧了，激化了矛盾和冲突。从下往上看，产业链的跨国延伸给移民群体，特别是被边缘化的有色人种群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同样是互补互利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和产业链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获得了资金和技术，可以用于自身的经济建设。全球供应链把企业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使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依赖。这种关系的深化有利于加深对人类共同体的认识，也有利于探讨气候变化和环境卫生等诸多全球性的问题。

然而，全球化弱化了边界，影响了冷战以后的世界格局，也为国际政治增添了新的变数。在新的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已成世界瞩目的焦点。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许多国家为了阻止病毒传播，采取了应急措施。疫情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打乱了生产节奏，中断了物流，也暴露出全球贸易产业链的一些弱点。经济的不稳定和跨境传染的恐惧，伴随着国内外的各种矛盾冲突，会不会转化为更为激烈的新一轮的国际冲突？美国华人经济能否经受住更大的考验？也许认识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

注释

- ① 印度在这里泛指1947年以前印度半岛英国殖民地，1947年以后的印度指国家。
- ② Lydon, *Chinese Gold*, 67-68.
- ③ 同上, 56-58; 61-65; 131-160; 400-408.
- ④ Beth Lew-Williams,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7.

- ⑤ 贱民源于印度种姓制度下毫无社会地位的群体, 英语为 untouchables (不可接触者)。一旦被描绘成病毒传播者, 华人也就成了当时社会中的不可接触者。关于种族和病毒传播, 参见 Nayan Shah, *Contagious Divides: Epidemics and Rac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⑥ 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 菲律宾人在移民和归化问题上和其他亚裔略有不同。
- ⑦ 这里指的是移民, 美国出生的二代亚裔另当别论。
- ⑧ Report of the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hinese Immigration, 44 Congress, 2nd Session, Senate Report No 680, 1877, 767.
- ⑨ W. W. Hollister Family Histo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ollister family collection, 1950.
- ⑩ 一般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国际资本发展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现象。
- ⑪ Mae Ngai, "Chinese Gold Miners and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alifornia and Victori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01 (4) 2015, 1809.
- ⑫ A. Dudley Gardner, "Chinese Emigrants in Southwest Wyoming, 1868-1885," in Arif Dirlik, *Chines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 341-348.
- ⑬ Min Zhou,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1-118.
- ⑭ Edna Bonacichi and Richard P. Appelbaum, *Behind the*

Label: Inequality in the Los Angeles Apparel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

⑮ 同上, 3.

参考文献

- [1] Lydon S. *Chinese Gold: The Chinese in the Monterey Bay Region* [M]. California: Capital Book Co., 1985: 550.
- [2] Chan S. *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9*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528.
- [3] Lew-Williamms B.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49.
- [4] Zhao X J. *Remaking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Family, and Community, 1940-1965* [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5.
- [5] Friday C. *Organizing Asian American Labor: The Pacific Coast Canned-Salmon Industry (1870-1942)*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85.
- [6] Drehler D V. *Triangle: The Fire That Changed America* [M].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3: 352.
- [7] Alejandro P.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7.
- [8] Saxenian A.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38.

Chinese Gold: Chinese American Economy against Adversity

ZHAO Xiaojian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s is highly unusual. During the Chinese Exclusion Movement and the period of apartheid, Chinese immigrants built a tight-knit community and ceaselessly explored to seek opportunities to survive against adversity. China-US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 allowed Chinese Americans to be accepted by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The two nation's hostility in the Cold War, however, put many of them back into fear. The rise of Asia and improved US-China relations, especially China's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global trade and supply chain, has provided Chinese American entrepreneurs with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Currently, US-China competition has become a hotspo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Chinese American economy sustain tougher challenge? It might take time to realize that.

Key words: Chinese American; ethnic economy; globalization; supply chain; U.S.-China relation